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执政六十年”
60 丛书

中国共产党 治国经济方略研究

武力 彤新春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126 8402 2

“执政六十年”
丛书

中国共产党 治国经济方略研究

武力 彤新春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国防大学 2 126 8402 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治国经济方略研究/武力, 彤新春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300-11285-5

I. 中...

II. ①武...②彤...

III. 经济政策-研究-中国

IV. F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4746 号

中国共产党治国经济方略研究

武 力 彤新春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7.25 插页 1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5 0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恢复经济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方针	5
第一节 执政初期面临的残破经济基础和严峻国际环境	5
第二节 巩固新生政权的三大经济举措	8
一、平抑物价	8
二、统一财经	9
三、调整工商业	11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15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确定	15
二、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16
三、开展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19
第二章 加速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方针	22
第一节 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确定	22
一、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环境	22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形成	25
三、“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28
四、八大前后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31
第二节 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顺利实现	34
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34
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36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1
四、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7
五、八大前后对所有制问题的探索	50
第三节 应对经济“紧运行”的综合平衡办法	53
一、1953年的小“冒进”与稳步前进方针的提出	53
二、1956年“冒进”的形成	56

三、“反冒进”的提出及初步实施	60
四、八大前后的继续“反冒进”	62
第三章 完善单一公有制和探索计划经济的方略	65
第一节 “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的两种探索	65
一、八大前后的探索	66
二、“积极平衡”思想和“大跃进”	69
三、应对危机的国民经济调整	70
四、国民经济调整中的新思路	74
五、精神激励方法的充分运用	80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方略	85
一、“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冲击和破坏	85
二、经济工作中的三项重要举措	87
三、艰难进行的两次经济整顿	96
第四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方略	101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经济发展的方略	101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调整方略	102
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	106
三、调整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方略	108
第二节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略	109
一、因势利导实现农村改革突破	110
二、及时启动城市经济改革	114
第三节 关于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	121
一、“四个现代化”战略发展目标的提出及重要意义	121
二、“三步走”战略构想的提出	123
第四节 改革理论的新突破和应对经济波动	126
一、党关于改革理论的新突破	127
二、错综复杂的发展与改革	129
三、对经济环境和秩序的治理整顿	131
四、治理整顿中的继续改革	133
第五章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略	137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进展	137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方略的确定	138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	138
三、培育市场体系的方略和政策	139
第二节 “八五”计划的调整和“九五”计划	139
一、“八五”计划的调整	140
二、“九五”计划的制定及其初步实施	143
第三节 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	144
一、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	144
二、金融深化和改革迈出重要步伐	146
三、投融资体制出现重要变化	147
四、计划体制改革加快,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	148
第六章 跨世纪战略的提出和初步实施	149
第一节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149
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信息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 到来	149
二、国内经济的变化:买方市场的形成	151
第二节 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提出	153
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54
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156
三、科教兴国战略	158
四、新型工业化战略	160
第三节 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方略	164
一、“两个大局”思想的由来及发展	164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	166
三、振兴东北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168
四、中部崛起战略的出台及初步成效	171
第四节 促进“两个利用”的对外经济方略	176
一、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全面开放	177
二、加入 WTO 的谈判方略	179
三、加入 WTO 后对外开放的新特点	181
四、对外开放的成就	183
五、对外开放的新问题及新对策	185
第七章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全面发展战略	188
第一节 新问题和新思想	189

一、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面临的新问题	189
二、关于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新思想	193
第二节 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199
一、政府经济职能转变问题的提出	199
二、2003 年以来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201
第三节 统筹城乡关系的新举措	203
一、对工农关系的新认识和新政策	204
二、政府实施的“反哺”政策和措施	205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6
第四节 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209
一、稳定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	209
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节能减排	210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	212
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	213
第五节 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稳定经济的方略	214
一、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全球	215
二、中国从容应对金融危机	218
三、危机处置初见成效	221
第八章 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经济方略	227
第一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的由来及发展	228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的由来	228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的不断完善	229
第二节 关于香港回归和回归后保持繁荣稳定的方略	231
一、回归前的香港经济状况	232
二、回归过程和制度安排	235
三、回归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	237
四、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关系	240
第三节 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经济发展	242
一、回归前的经济发展状况	242
二、回归过程和制度安排	245
三、回归十年来的经济发展	248
四、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关系	251
第四节 关于和平统一台湾和发展两岸经济关系的方略	252

一、台湾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253
二、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经济政策	258
三、改革开放以来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关系	261
主要参考文献	266
后 记	268

导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国际地位也日益提升。从18世纪的“泥足巨人”、“东方睡狮”到21世纪的“腾飞的巨龙”，中国走过了漫长的经济发展之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才真正走出贫困和动乱的“陷阱”，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的新阶段。回顾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既有令人振奋的辉煌，也有叫人痛惜的失误，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对于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执政为民”的宗旨和现代化战略目标，更需要深入总结历史经验。

13世纪，来自西方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时看到的繁华和财富令他无比震惊，他将这种震惊告知给西方人。从此，西方人便对东方这个古老的神秘国度充满了期待。19世纪中期，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的大门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着尖锐社会矛盾的古老帝国：一方面是皇帝和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是民不聊生，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其真实写照。这个步履蹒跚的帝国拥有着一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儒家文化，它是一个敦厚的礼仪之邦，然而这种古老和敦厚似乎不堪一击。战争的苦痛折磨了这个国家100多年。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内忧外患的中国才迎来了自身的独立，并自此开始了真正的经济追赶进程。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的历史约束下成为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它也使中国经济呈现了更多的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色彩。在严峻的和被孤立的国际环境下，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一再受挫的情况下，中国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条道路使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30年的飞速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并且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到2008年底,中国的GDP已经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300670亿元,人均GDP也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2008年的22698元,根据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6.948的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GDP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但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过去经历了较多的曲折和困难,而且今后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虽然我国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煤炭和水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资源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30%。同时,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也很低,只有33%左右,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人均资源很少的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和社会都呈现出剧烈转型的特点。不仅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而且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和市场失序问题等,也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尽管存在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经济发展成就的取得,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也是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不过,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遇到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也使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任重道远,必须不断地、及时地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回顾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辛历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第一,社会主义观念和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成功实践,就说明了这一点。建国6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明,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国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顺利、就成功,就得到人民的拥护;什么时候我们从教条出发,脱离实际,或囿于成说,不敢创新,就会遭受挫折,就会走弯路。

第二,“三个有利于”标准和“发展是硬道理”是把握历史契机的关键。纵观建国 60 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曾经错失几次历史机遇,也抓住了几次历史契机,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1978 年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曾经有过三次改革和发展的探索,但是都被政治因素打断了:第一次是 1956 年吸取苏联教训对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的探索,被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和 1958 年的“大跃进”打断;第二次是 1961—1963 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探索,被 1964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打断;第三次是 1974 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的治理整顿,被随后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断。与此相反,1978 年以后的每个关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当有关改革和发展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都坚持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及时地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历史契机。

第三,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新中国 60 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最主要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正确认识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即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这两只手,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如何做到最有效地使用这两个手段,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目标。改革开放以前所实施的五个五年计划,效果最好的是“一五”计划,而“一五”计划期间恰恰是同时运用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两个手段。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也是有赖于同时运用这两种手段。特别是 1997 年以来的十多年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国民经济的调控是维持经济高速发展、平稳增长的关键所在,也是弥补“市场失灵”、建立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我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抵御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与我们拥有强大的“政府之手”分不开的。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人均资源的短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必须尽可能地学习和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当我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积极地利用国际援助和国外的资源、市场,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快,效果就比较好,反之,则使经济建设受到影响和制约。

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到 1978 年对外开放以前，相对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拉大了我们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距离。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独立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国适时提出了以“利用外资、利用国外市场”为特点的“两个利用”政策，并于 2001 年成功加入 WTO，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和竞争。

第一章 恢复经济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方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战后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使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的频频受阻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终于得以迅速推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实行了高积累的发展战略，为推进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热情和劳动；另一方面，为了寻找更快的经济发展道路，又在经济制度方面进行了频繁的变革，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第一节 执政初期面临的残破经济基础和严峻国际环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

旧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受长期战争破坏和腐败政治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传统农业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国内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里，旧中国的经济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国民经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长期战争的破坏，发展非常缓慢，现代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低，到20世纪40年代，也不过百分之十几。第二，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一方面表现在地区之间，即沿海与内地之间形成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乡之

间、产业之间形成的“二元经济”，即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沿海城市已经开始现代化了，但是广大的乡村地区依然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农业经济不但没有走上现代化之路，而且日趋衰落。第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革命战争形成的纷繁格局，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地区。

与上述经济概况及特点相对应，旧中国的经济体制也表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特征。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民经济主要由外资企业（外国资本）、国营企业（官僚资本）、公私合营企业（官商合办）、私营企业、封建地主私有制、个体经济组成，在上述经济成分中，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私有制占统治地位。从运行机制来看，旧中国的经济运行受着多种因素的交叉重叠制约，以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为例，经济运行即受到市场机制、帝国主义、战争、政府四种因素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方面接过了国民党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另一方面则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解放区的经验，重新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即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明确的表述。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同时期外国的经济体制相比，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它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之上的，即是贯彻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的结果，不没收官僚资本和进行土地改革，也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第二，它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即国民经济除了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公私合营经济、个体经济外，也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第三，采取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当时虽然没有使用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这两个名词，但实际上经济运行是受这两个手段制约的，即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公私合营企业、供销合作社靠计划控制，至于数量众多的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则主要靠市场调节。第四，国家实行“节制资本”和“统制外贸”政策。即对私人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此时的“改造”不同于后来的消灭，它主要是指调整产业结构和改善经营管理）；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国家控制的贸易许可证制和结汇制，以保护和发展国内工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存在着国家独立、政府有威信和效率、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高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经济

发展的因素，而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则是长远的。这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经济发展的起点低，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工业化始于19世纪60年代，但是在其后的80年间，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战争的蹂躏，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不仅工业化水平很低，而且经济残破不堪。除了前述的工业基础薄弱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发展极端不平衡外，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也很紧张。1949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0.2%，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已达5.4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5%，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1949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为2.7亩，世界为5.5亩）。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分布很不均匀，占全国土地面积36%的东南部地区，人口却占全国总数的96%。从城乡之间的人口分布来看，1949年仅有10.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现代工业及基础设施少得可怜，并且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城市失业问题同样严重，资金积累困难成为长期制约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

第二，人口素质较差。由于经济落后造成的生活贫困、教育水平低、医疗卫生条件差，使得大部分劳动力素质很低，劳动人口大量过剩与劳动力结构性严重短缺并存。旧中国20~40岁的成年人平均体重只有52公斤，平均身高仅为161.5厘米，全国人均寿命35岁，旧中国人口不仅身体素质差，而且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非常少，尤其是经济管理人才严重不足。这一点严重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的进程。

第三，由于受到西方的经济封锁，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国际环境仍然很严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界已经划分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处于冷战时期。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美两国被卷入战争，使得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严厉经济封锁，虽然可以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但是由于苏联本身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使得其资金也很短缺，援助有限，另外其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与中国趋同，使得两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不大，几乎不可能实现资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当西方国家靠对外开拓市场和掠夺殖民地而实现工业化、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靠吸引外资和比较贸易优势推进工业化时，中国则不得不主要依靠自己的积累、技术

和人才来推进工业化。

第二节 巩固新生政权的三大经济举措

新中国的建立，是靠枪杆子即武装夺取政权实现的，其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它们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同样，从经济上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也采取了三项可以称之为奠基之作的重大经济举措，这就是“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三大举措的成功实施，使新中国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对于建国之初国民经济的稳定和迅速恢复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三大举措的成功实施，也被称为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三大经济举措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经济的“牛刀初试”，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经济的能力在当时经济凋敝、物价飞涨、经济混乱的烂摊子面前得以充分展现。

一、平抑物价

1949年初，随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解放区已拥有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新中国的诞生已经为期不远了，与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相对应，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如何在经济上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基础的问题。在这方面，除了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以建立人民政府的国营经济外，最迫切、最重要的是通过发行新货币来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由于经济破坏严重和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人民政府自1948年12月发行人民币以后，不得不靠超额发行货币来弥补军费开支的不足，再加上社会受国民党长期剧烈通货膨胀政策的影响，重物轻币，因此，为了使人民币“站稳脚跟”，除了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打击金融投机外，能否平抑和控制物价，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个战役。

建国前后，受国民党长期剧烈通货膨胀政策和人民币因财政困难过量发行的影响，曾出现了四次物价大波动。

第一次物价波动发生于1949年4—5月的华北，由粮价上扬带动工业品价格上涨，以物价波动中心天津为代表，物价上涨近1.2倍。人民政府应对这次物价波动的主要措施，第一是对带动物价波动的商品，如粮食、棉纱、棉布，实行大量抛售；第二是对职工实行低价供应粮食、棉

布和日用必需品的政策；第三是疏通物资流通渠道，努力恢复交通，使东北的粮食进关；第四是实行“折实存款”，回笼货币。上述措施有效地平抑了这次物价上涨风潮。

第二次物价波动发生于1949年7月，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华北和华中。这次物价波动仍然以粮食为带头商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上涨1.5倍，天津物价上涨2倍。人民政府平抑物价的主要措施除了组织大量抛售和折实存款外，还采取了严厉打击金融投机、引导游资转向生产等办法，取缔了上海证券交易大楼的违法金融活动，组织企业和商人到农村收购棉花。由于措施得力和各方面的配合，到7月底，第二次物价上涨风潮基本平息下来。

第三次物价波动发生于1949年11月，带头商品还是粮食。这次物价上涨幅度大、地区广，波及了新解放的西北、西南和华南。天津综合物价指数上升了310.5%，上海上升了326.2%。由于新中国政府对这次物价上涨早有估计，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主要实行有计划的集中抛售，以打击投机资本、控制物价。与此同时，还配合采取了惩治违法投机商、整顿税收、紧缩投放和加强折实存款等措施，很快平息了建国初期这一次最严重的物价上涨风潮。

第四次物价波动发生于1950年2月春节前后。波及的主要是几个大城市，物价上涨幅度以1949年底为基期，重庆上涨186%，西安上涨132%，广州上涨73%，天津上涨83%，上海上涨71%，武汉上涨68%，沈阳上涨57%。政府对付这次物价上涨风潮的主要措施，除继续采取行之有效的抛售外，还双管齐下，一是迅速恢复生产，增加供给；二是压缩需求。2月9日，中财委下达指示，命令上海以外各地纺织厂延长生产时间，突击增产，并规定当年减发军衣，暂停机关团体从市场上购布。在压缩社会团体购买力的同时，还通过发行公债和征收工商税滞纳金的办法，压缩社会需求。另外，从1950年3月份开始实行的统一财经措施，从财政上保证了物价的稳定。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个“战役”终于在1950年3月胜利结束。

二、统一财经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一方面，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国民经济经过长期战争破坏和消耗，已经处于崩溃状态，从而使新中国在财政方面不可能广开财源、增加收